

## 天长纪庄木牍所见槩姓考

蔡万进

2004年11月，安徽省天长市安乐镇纪庄村发掘清理一座西汉中期墓葬(M19)，出土木牍34方<sup>①</sup>。《简帛研究2006》刊发《天长西汉木牍述略》(以下简称《述略》)，文中首次公布了该墓17号木牍的初步释文<sup>②</sup>；《文物研究》2010年第17辑登载《刍议天长纪庄西汉木牍》，随文又发表了17号木牍的图版照片<sup>③</sup>。17号木牍是一份记录墓主患病亲朋好友探视所送礼品的清单，内容涉及致送人姓名、致送物品名称及数量，对研究汉代江淮地区姓氏构成、社会风俗与生态环境变迁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学术界于此牍的姓氏学价值迄今鲜有讨论<sup>④</sup>，本文拟就木牍所见汉代槩姓及其相关史实试作考述。

### 一、木牍所见汉代槩姓及其分布

17号木牍，长22.8厘米，宽6.7厘米，正背面各分两栏书写文字，内容为<sup>⑤</sup>：

①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以下称《简报》。目前，学术界对于天长纪庄汉墓的年代学考察，已将墓葬年代由《简报》的“西汉中期偏早”，调整确定在武帝末年太初改历以后至宣帝五凤四年间，如杨振红《纪庄汉墓“賈且”书牍的释读及相关问题》(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称：“根据书牍中十二月上计以及广陵国存续的时间，确定墓葬的年代在武帝太初三年至宣帝五凤三年间”；陈刚、李则斌《关于安徽天长纪庄汉墓年代学的考察——以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为线索》(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称：“墓葬下葬的时代接近于前127年和前70年的中间时段”；王晓光《天长纪庄木牍墨迹研究及书写时间新探》(《简帛研究2010》)认为：墓葬时间或在“宣帝五凤三年十二月末至四年正月初之间”的此后不久。

②杨以平、乔国荣：《天长西汉木牍述略》，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5—202页。

③杨以平、王震：《刍议天长纪庄西汉木牍》彩版一二·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14—321页。

④目前仅见戴卫红《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所见礼单考析》(《简帛研究2010》，第82—88页)一文曾涉及17号木牍人名“姓+字”组合特征的探讨。

⑤该处木牍释文，已据杨以平、王震《刍议天长纪庄西汉木牍》一文提供的17号木牍图版照片校改，其中个别文字的校改同时还吸收了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整理小组的意见。

□ (第1行)

棗中翁石四斗雉一只 (第2行)

棗卿石四斗 (第3行)

棗中君石鳴(?)一 (第4行)

棗□人五斗魚一 (第5行)

□ 翁□石雉一只 (第6行)

(以上为正面第一栏)

棗翁中梁米二斗 (第1行)

董父酒一斗彊煩二只 (第2行)

朱中孺四斗煩一只 (第3行)

蔡正(?)彊煩四只 (第4行)

陳嘒(?)麋一 (第5行)

陳中公麋鳴(?)一只 (第6行)

(以上为正面第二栏)

□ 少翁彊煩二只 (第1行)

棗少君雉一只 (第2行)

范卿魚一枚 (第3行)

(以上为背面第一栏)

□

匠

旁(?)

(以上为背面第二栏)

木牘正、背面记载了致送人姓名及致送物品如米、酒、雉、魚、麋、煩(鷺)<sup>①</sup>等的名称与数量,《述略》称这是“一张礼品记录单,是孟生病时亲朋好友探视带来的礼品”。

汉代某人生病,亲朋好友乃至皇帝有探视致医药、送饮食、致信存问患者之俗。《史记·淮南列传》:“前日长病,陛下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sup>②</sup>《汉书·公孙弘传》:“上报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闲,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辅助医药以自持。’因赐告牛酒杂帛。”<sup>③</sup>《汉书·盖宽饶传》:“宽饶初拜为司马……躬案行士卒庐室,

①煩,或同“鷺”,为“鷺”的俗写。《尔雅·释鸟》:“鷺,白鷺。”郭璞注:“似鷹,尾上白。”参见戴卫红:《天长纪庄汉墓木牘所见礼单考析》,第86页。

②司马迁:《史记》卷一八,中华书局,1992年,第3077页。

③班固:《汉书》卷五八,中华书局,2002年,第2622页。

视其饮食居处，有疾病者身自扶循临问，加致医药，遇之甚有恩。”<sup>①</sup>天长纪庄汉墓出土的木牍书信多与墓主谢孟生病有关，如6号木牍“孙霸致谢卿书”：“甚苦病者，玉体毋恙……寒时不禾（和），霸愿卿为侍前者幸强酒食，近衣炭，以安万年”；12号木牍“方被致孟书”：“孟脾（體）不安，善少谕（愈）”，“寒时少进酒食，近衣炭，慎病自宽毋忧（正面）”；13号木牍载有“桔梗一两，乌喙三果（颗），甘草三尺”等中草药名与剂量的药方<sup>②</sup>。墓主谢孟生病期间，这些亲朋好友不仅纷纷来信表达关切、问候并致送医药，有的甚至同时还送来了“米一石鸡一只”等物品，如12号木牍背面记：

米一石鸡一只（第1行）  
贱弟方被谨使使者伏地再拜（第2行）  
进（第3行）  
孟外厨 野物幸勿逆被幸甚幸甚（第4行）

17号木牍所记与上述文献记载一致，表明17号木牍的性质当为墓主患病期间亲朋好友致送物品的记录无疑。

17号木牍所记致送谢孟物品的人员当中，若计姓氏用字释读明确者，共涉及六姓十二人<sup>③</sup>，分别是檀、董、朱、蔡、陈、范等，其中以檀姓人员为最多，有檀中翁、檀卿、檀中君、檀口人、檀翁中、檀少君等。天长纪庄汉墓墓主，由木牍文字推知为谢孟，汉时东阳县人，如3号木牍书有“谨伏地再拜进书 孟马足下”，14号木牍书有“谢汉进东阳谢孟”。秦汉东阳城遗址地在今江苏省盱眙县东阳镇，《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东阳故城在楚州盱眙县东七十里，秦东阳县城也，在淮水南。”<sup>④</sup>《太平寰宇记》卷十六：东阳故城“在县东七十五里。按，《史记·项羽纪》注云：东阳县本属临淮郡，汉明帝分属下邳，后复分属广陵。……楚汉之际，曾以为荆国，封刘贾为荆王，而王东阳，即此地也。”<sup>⑤</sup>《困学纪闻》卷十：“广陵郡东阳县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东阳今盱眙县。”<sup>⑥</sup>从地望上看，秦汉东阳城与今盱眙东阳位置相符。1961和

①班固：《汉书》卷七七，第3244页。

②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公布了该墓出土的其中10方木牍的图版照片与释文，杨以平、乔国荣《天长西汉木牍述略》又新增公布了包括17号木牍在内的3方木牍释文。以下凡引天长纪庄木牍，皆见《简报》和《述略》，不再一一出注。本文所引木牍释文，皆已据《简报》、《述略》提供的木牍图版照片校改，其中个别文字的校改同时还吸收了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整理小组的意见。

③17号木牍正面第一行前半部分残缺，后半残留部分不见文字；另有两人的姓氏因木牍残缺而无法辨识。

④司马迁：《史记》卷七，第299页。

⑤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319页。

⑥王应麟撰，[清]翁元圻注：《困学纪闻》卷十《地理》，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41-842页。

1976年南京博物院对东阳故城遗址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确认这是一处汉代城市遗址<sup>①</sup>。近年在城址周围的秦汉墓葬发掘中，也多次发现与“东阳”有关的文字资料，1990年小云山一号汉墓出土的10件漆盘，外底朱书“东阳庐里巨田侯外家”<sup>②</sup>；2009年抢救发掘的大云山西汉古墓群，在陪葬墓中发现刻有“东阳”的陶器残片<sup>③</sup>；这次天长纪庄汉墓出土木牍中又多次出现“东阳”地名，如14号木牍写有“进东阳”，10号、15号木牍书有“留东阳”、“东阳丞”，这些汉墓都紧邻东阳故城，可证东阳故城必为秦汉东阳县城无疑，这些墓地亦应都是秦汉东阳城中居民的墓葬。墓主谢孟患病，各方面人士或致信问候，或致送药方，或送来米、鸡、野物等慰问品，对照17号木牍所记物品，除米、酒外，多有雉、鱼、麋等野物、鲜物，而据文献记载，这些都应是汉代江淮地区所产之物，有的本身即是秦汉东阳县之特有物产。如雉，《说文解字》：“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摇（鶡），南方曰翟，东方曰甾（鶡），北方曰稀（鶡），西方曰蹲（鶡）。”<sup>④</sup>《后汉书·明帝纪》：“（十一年）是岁，巢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sup>⑤</sup>麋，《续汉书·郡国志三》“广陵郡东阳县”刘昭注：“县多麋。《博物记》曰：‘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峻。民人随此峻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鱼，《续汉书·郡国志三》“广陵郡”条云：“东阳，故属临淮。有长洲泽。”<sup>⑥</sup>秦汉文献中所谓的“泽”，是指沼泽湿地<sup>⑦</sup>，秦汉东阳县地当“淮东”（淮河以南），紧邻淮河，境内“长洲泽”鱼类资源丰富。雉、鱼、麋等乃汉时民间狩猎之物，《史记·田叔列传》：“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安留，代人为求盗亭父。后为亭长。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众人皆喜。”<sup>⑧</sup>上述记载反映，木牍所记这些致送物品人员所居当离东阳不远，抑或即是东阳城中居民或本县人<sup>⑨</sup>，准此，汉代东阳县有棗姓存在和分布当为不争之事实。

①尹焕章、赵青芳：《淮阴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3年第1期。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下册“泰安市·盱眙县·东阳城遗址”条，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第619-620页。

②盱眙县博物馆：《江苏东阳小云山一号汉墓》，《文物》2004年第5期。

③蔡震：《盱眙千年汉墓初揭面纱》，《扬子晚报》2010年7月16日第A10-11版。

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慎等著：《汉小学四种》，巴蜀书社，2001年，第148页。

⑤范晔：《后汉书》卷二，中华书局，1991年，第114页。

⑥司马彪：《续汉书》，《后汉书》，第3461页。

⑦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116页。

⑧司马迁：《史记》卷一〇四，第2779页。

⑨目前这一推断也得到考古发掘证明，据南京博物院陈刚先生告知，在新近东阳汉墓群发掘中，有6座西汉中期昭宣时期的墓葬出有棗姓的印章和漆器铭文，疑为一处棗姓墓地。发掘资料现存南京博物院。

## 二、汉代棟姓播迁与武帝徙民会稽

天长纪庄汉墓 17 号木牍所载棟姓，为迄今出土秦汉简帛所首见。该姓见于秦汉传世文献，《汉书·闽粤传》：元封元年（前 110）冬，“东粤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史。楼船军卒钱唐棟终古斩徇北将军，为语兒侯。”师古曰：“钱唐，会稽县也。棟，姓；终古，名也。棟音袁。”<sup>①</sup>如是，则汉代江南会稽郡钱唐县亦应有棟姓分布。

汉代姓氏用字“棟”，《方言》卷五：“簾，棟也。兖豫河济之间谓之棟。”郭璞注：“所以络丝者也。”<sup>②</sup>《说文》“簾，收丝者也。从竹，簾声”段注：“《方言》曰：‘簾，棟也。兖豫河济之间谓之棟。’郭云：‘所以络丝者也。’音爰。按，今俗谓之簾车。”<sup>③</sup>棟与簾，字异而物同，指一种绕丝线的工具，“兖豫河济之间”的方言谓“簾”为“棟”。“棟”字在“兖豫河济之间”的使用可能较早，如《管子·霸形》：“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棟，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诸子评议·管子三》俞樾按：“此文棟字，当训为络。”<sup>④</sup>齐国西、北边境，《通释》载“西有浊河之限”，《博物志》云“北有河、济”<sup>⑤</sup>，地处“河济之间”，“棟”字的使用正与扬雄《方言》所载“兖豫河济之间”方言区域相合。上述情况或可表明，在“兖豫河济之间”同时亦应有以“棟”为姓氏用字的，换言之即汉代棟姓亦应最早主要地分布在“兖豫河济之间”<sup>⑥</sup>，江南会稽钱唐棟姓以及上述江淮东阳棟姓皆非土著，应系由他处播迁而来。

江南会稽钱唐棟姓的播迁，据考应与西汉武帝徙民会稽一事有关。武帝徙民会稽，事见《汉书·武帝纪》：

（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sup>⑦</sup>

《汉书·武帝纪》所记徙民会稽一事，是目前所知自中原移民会稽的最早记载，

①班固：《汉书》卷九五，第 3862 页。

②钱绎：《方言笺疏》，《汉小学四种》，第 1317 页。

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汉小学四种》，第 198 页。

④转引自宗福邦、陈世饶、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棟”字义项⑤，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135 页。

⑤董说：《七国考》卷三《田齐都邑》，中华书局，1998 年，第 117、119 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精装本）》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 年，第 33–34 页。

⑥棟姓与辕姓同系一族，其得姓受氏当与辕姓同，参见本文第三节相关论述。辕姓源于春秋陈国（西汉地属兗州刺史部，东汉改属豫州刺史部），后陈国公子完出奔齐国，后裔代齐，齐地亦当有辕姓存在（如汉初齐人辕固，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或有改“辕”为“棟”作为姓氏用字的（古音辕与棟通，棟字在齐地的使用又较早），故汉代棟姓与辕姓一样，亦应最早主要地分布在“兖豫河济之间”。

⑦班固：《汉书》卷六，第 178 页。

前人研究一向认为《汉书》记载有误，事实上并不存在此事，如葛剑雄认为，《武帝纪》“会稽”二字应属衍文<sup>①</sup>；史念海认为，《汉书·武帝纪》“会稽”有误<sup>②</sup>。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一文认为，《汉书》所记元狩四年（前119）徙民会稽事确实可信，指出：从地理条件上讲，会稽亦比同时接纳受灾移民的陇西等地更为适宜；瓠子河决造成的持续水灾，是促成朝廷移民的直接原因，而移民会稽的深层动机，除徙民实边，以抵御越人侵袭的原因外，则有通过移民会稽来巩固东南边防的意图<sup>③</sup>。证诸史籍所载西汉会稽郡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元狩四年徙民会稽十几年后即平定东越，辛氏之说可从。

会稽郡，秦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sup>④</sup>《汉书·严助传》曰：“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sup>⑤</sup>知此时的会稽郡境与秦末汉初同。武帝平定东越，东瓯、闽粤地属会稽郡，会稽郡南界遂至南海海境，领二十六县。会稽郡是西汉武帝时征伐东越的前沿基地，《汉书·严助传》：“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sup>⑥</sup>又，元鼎六年东粤王馀善刻“武帝”玺自立，“上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师古曰：“句章，会稽之县。”<sup>⑦</sup>《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元鼎六年，“韩说为横海将军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中尉王温舒出会稽，皆破东越。”<sup>⑧</sup>终武帝一代，汉对东越用兵，都曾是从会稽出兵的，这说明会稽是汉朝对东越用兵的军事前哨，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

汉武帝对于东越用兵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在采取军事步骤予以坚决打击的同时，也采取了移其民、虚其地的政策，如《汉书·闽粤传》：“建元三年（前138），闽粤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遣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汉兵未至，闽粤引兵去。东粤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sup>⑨</sup>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平灭东粤，“于是天子曰‘东粤陋多阻，闽粤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sup>⑩</sup>与此相对应，徙民实边势在必行，一方面在用兵过程中可以就地、就近征用兵员，另一方面又可将内地

①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10章第3节《武帝时徙民会稽辨证》，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第4章第3节《人口的迁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司马迁：《史记》卷六，第234页。

⑤班固：《汉书》卷六四上，第2789页。

⑥班固：《汉书》卷六四上，第2776页。

⑦班固：《汉书》卷九五，第3862页。

⑧司马迁：《史记》卷二二，第1140页。

⑨班固：《汉书》卷九五，第3860页。

⑩班固：《汉书》卷九五，第3863页。

之民补充到东越人故地，稳固边防。因此，元狩四年（前119）冬武帝徙民会稽之举，是有历史根据的。

元狩四年徙民会稽的贫民来源，辛氏一文认为，自武帝元光三年（前132）瓠子河决水灾至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亲临瓠子这场灾难结束的二十馀年间，“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sup>①</sup>，元狩三、四年应当是其中灾情较重的一个时期，武帝所徙的这部分“关东贫民”应当即是来自于“梁、楚之地”的灾民<sup>②</sup>。汉时的梁王国、楚王国，地在今淮河北岸的黄淮之间，这些来自于淮河北岸地区“梁、楚之地”的贫民，南渡淮河、长江，是很容易进入会稽地区，远比迁往西北边地要近便许多。西汉“梁、楚之地”，正处于上述“棗”字方言区——“兗豫河济之间”范围内，此后不久的武帝元鼎年间又曾有诏令“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的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之举<sup>③</sup>，我们有理由认为汉代江南钱塘棗姓的存在和分布或与武帝徙民会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有关<sup>④</sup>，而天长纪庄汉墓17号木牍所载东阳棗姓的发现，虽然具体播迁原因尚难明确，但无论何种情形，从现有资料看，汉代棗姓由“兗豫河济之间”较早发源而后播迁“江淮（徐州刺史部）”、“江南（扬州刺史部）”的客观事实，或许又为传世文献所载武帝徙民会稽史事提供了佐证。

### 三、汉代棗姓流变与国三老袁良碑

17号木牍所载棗姓，秦汉传世文献中仅1见，即上引《汉书》所载的“楼船军卒钱唐棗终古斩徇北将军”之事。此事又见于《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只是《史记》作“楼船将军率钱唐棗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兒侯”，张守节《正义》曰：“钱唐，杭州县。棗，姓；终古，名。”<sup>⑤</sup>

棗之为姓，起源较早。秦嘉谟《世本辑补》卷六《传》：“棗氏，申公犀生靖伯庚。申公生靖伯。涛涂生选，选生声子罕，罕生惠子雅，雅生頫。桓子侨者，涛涂四世孙。”<sup>⑥</sup>《通志·氏族略三》：“棗氏，陈棗涛涂之后。《史记》儒林有棗固，

①班固：《汉书》卷二九《沟洫志》，第1682页。

②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③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37页。秦汉时期，“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是完全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地域概念”，“《汉书·武帝纪》所谓‘关东’同样完全可以与‘山东’（《史记·平准书》）相互替换，二者表述的是同一地域概念”（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汉书》记载元狩四年（前119）徙民会稽，元封元年（前110）“楼船军卒钱唐棗终古斩徇北将军”，二者相距九年，棗终古作为移民会稽钱唐之人，数年后被应征服兵役是完全可能的。

⑤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四，第2983页。

⑥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57—158页。

《汉书》有辕丰。”<sup>①</sup>辕涛涂，见于文献记载，《左传·僖公四年经》：“齐人执陈辕涛涂。”<sup>②</sup>《史记·陈杞世家》：“三十七年，齐桓公伐蔡，蔡败，南侵楚，至召陵，还过陈。陈大夫辕涛涂恶其过陈，诈齐令出东道。东道恶，桓公怒，执陈辕涛涂。”<sup>③</sup>琅邪王相笺注《百家姓考略》：“陈大夫庄伯辕孙涛涂，以祖字为氏，后世去车为袁，或作爰，实同出一源也。”<sup>④</sup>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曰：“《礼记·大传》正义：诸侯赐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孙，公孙之子其亲已远，不得上连于公，故以王父字为氏。”<sup>⑤</sup>

《史记》、《汉书》所记“终古”的姓氏用字——“棖”与“辕”的不同，恰恰反映两者之间应有一定的关系。“棖”与“辕”古韵皆在元部，同为于母平声<sup>⑥</sup>，二字读音相同。其次，两者在训诂学意义上亦颇有义近之项。棖，典籍中又训作“络”、“爰”，如《管子·霸形》“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棖”，俞樾按：“此文棖字，当训为络。”《方言》卷五：“簾，棖也。”钱绎笺疏：“棖之言爰也。爰，引也。《说文》云：‘爰，籀文以为辕字。’”关于“棖”的形制，《方言》卷五：“簾，棖也。”钱绎笺疏：“今人络丝之器，刻木为六角，围尺许，以细竹长五六寸者六联其上，下复为穿，纳柄于其中，长二三尺，持其柄而摇之，则旋转如车轮，谓之络车。”<sup>⑦</sup>辕，《左传·宣公十二年》“军行，右辕，左追蓐”孔颖达疏杜预注曰：“楚阵以辕为主，故以辕表车。”<sup>⑧</sup>由此可见，棖与辕音同义近，可通<sup>⑨</sup>。班固改《史记》“辕终古”作“棖终古”，表明汉代确有“棖”之姓氏用字；“棖”与“辕”通，说明天长纪庄汉墓 17 号木牍所载棖姓即辕姓，两者同系一族。

天长纪庄汉墓 17 号木牍所载棖姓即辕姓，已如上述，而相关传世文献记载反映汉代棖（辕）姓与袁姓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汉时姓氏用字已有改棖为袁和改袁为棖之例：

《左传·僖公四年经》“齐人执陈辕涛涂”<sup>⑩</sup>，《史记·齐太公世家》作“袁涛涂”<sup>⑪</sup>。

①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 年，第 461 页。

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288 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三六，第 1578 页。

④王相笺注：《百家姓考略》，中国书店，1991 年。

⑤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690—1691 页。

⑥《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2 年，“棖”，第二册第 1616 页；辕，第四册第 3031 页。

⑦钱绎：《方言笺疏》，《汉小学四种》，第 1317 页。

⑧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879 页。

⑨高亨、董治安亦云：“辕与棖”通（《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 年，第 167 页）。

⑩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 288 页。

⑪司马迁：《史记》卷三二，第 1489 页。

《左传·哀公十一年经》“陈辕颠出奔郑”<sup>①</sup>，《公羊传》作“袁颠”<sup>②</sup>。

《史记·高祖本纪》“袁生说汉王曰”<sup>③</sup>，《汉书·高帝纪》作“辕生”<sup>④</sup>。

又，对“前四史”中棟、辕、袁姓人名出现频率的统计，结果如下<sup>⑤</sup>：

棟，《史记》0；《汉书》1；《后汉书》0；《三国志》0

辕，《史记》3；《汉书》4；《后汉书》1<sup>⑥</sup>；《三国志》0

袁，《史记》5；《汉书》2；《后汉书》25；《三国志》30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汉代姓氏用字“棟（辕）”的消失与“袁”姓有关。

袁，《说文》：“长衣兒。”段注：“此字之本义，今只谓为姓而本义废矣。古与爰通用，如袁盎，《汉书》作爰盎是也。《王风》：有兔爰爰，《传》曰：爰爰，缓意。遠辕等字，以袁为声亦取其意也。”<sup>⑦</sup>古文字“袁”与“辕”、“爰”并通。《周礼·考工记·辀人》：“今夫大车之辕轊。”孙诒让正义：“古辕与爰、袁三字通用。”<sup>⑧</sup>《方言》卷九：“辕，楚卫之间谓之辀。”钱绎笺疏：“辕、袁、爰三字古并通。”<sup>⑨</sup>《释名·释车》：“辕，援也。”王先谦疏证补引皮锡瑞曰：“古辕、袁、爰三字通。”<sup>⑩</sup>又，《元和姓纂》卷四《袁》：“生诸，字伯爰，孙宣仲涛涂，以王父字为氏。”岑仲勉校引温校云：“古文爰、袁、辕、滾、棟、援通用。”<sup>⑪</sup>如是，可知汉代棟（辕）姓与袁姓亦同系一族<sup>⑫</sup>。

“前四史”棟、辕、袁姓人名出现频率统计中，《史记》只有袁姓、袁姓而无棟姓，说明西汉前期“辕”与“袁”通假并用，姓氏用字很少或不用“棟”；比《史记》晚出的《汉书》，棟、辕、袁同时出现，表明三字在姓氏意义上虽然通假，但还是有所区别，特别是班固改《史记》的“辕终古”作“棟终古”，说明汉代确有“棟”之姓氏用字，天长纪庄汉墓17号木牍印证班固所改正确；《后汉书》、《三国志》中“袁”姓共55例，“棟”姓未见，“辕”姓仅1见，而且是在追述西汉“辕固”时提及，如果抛此而论，《后汉书》、《三国志》中只有“袁”姓，

①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657页。

②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2351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八，第373页。

④班固：《汉书》卷一上，第41页。

⑤据《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8年）中“前四史”人名索引主目统计，特此说明。

⑥《后汉书·儒林列传》出现姓氏用字“辕”1例，系追述西汉辕固；东汉“辕”姓人名，《后汉书》不见。

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慎等著《汉小学四种》，第403页。

⑧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第3222页。

⑨钱绎：《方言笺疏》，《汉小学四种》，第1358—1359页。

⑩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汉小学四种》，第1548页。

⑪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年，第433—434页。

⑫汉代棟姓与袁姓同系一族，目前也得到考古发掘证明，据南京博物院陈刚先生告知，新近东阳汉墓群发掘的6座出土有棟姓印章和漆器铭文的西汉昭宣时期墓葬中，“棟”字即或省作“袁”同出。

这表明东汉三国以后，史书中的姓氏用字“棟”和“轔”消失而“袁”独存，古代文献姓氏用字上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姓氏与社会的变迁。

汉代姓氏用字“袁”取代“棟”、“轔”等成为该族姓氏的惟一用字（正字），确有历史根据和线索。《隶释》卷六《国三老袁良碑》云：

君讳良，字厚卿，陈国扶（乐人）也。厥先舜苗，世为封君。周之兴，虞阙父典陶正，嗣满为陈侯。至玄孙涛涂，初氏父字，立姓曰袁。鲁僖公四年为大夫，哀十一年，颇作司徒。其末或适齐楚，而袁生（缺）独留陈。当秦之乱，隐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册，天下既定，还宅扶乐。孝武征和三年，生曾孙幹，斩贼公先勇，拜黄门郎，封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幹崩，子经嗣。经崩，子山嗣。传国三世，至王莽而绝。君即山之曾孙，缵神明之洪族，资天德之清则，惇综《易》《诗》，而悦《礼》、《乐》。举孝廉、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讨江贼张路等，威震徐方。谢病归家。孝顺初政，咨（缺二字）白，三府举君，征拜议郎、符节令。时元子光，博平令；中子腾，尚书郎；少子璋，谒者。诏书壁（缺二字）可父事。群司以君父子俱列三台，夫人结发，上为三老。使者（缺）节安车亲（缺）几杖之尊，袒割之养，君实飨之。后拜梁相。帝御九龙殿，引君对覩。与酒饭，赐饮宴，册曰……

碑文记载袁良以顺帝永建六年（131年）二月卒，其孙卫尉袁滂立此石<sup>①</sup>。袁滂正史有载，《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春二月）癸丑，光禄勋陈国袁滂为司徒”，“（二年春）三月，司徒袁滂免”<sup>②</sup>。袁滂身居九卿及相，溯源姓氏，认为其祖“涛涂初氏父字，立姓曰袁”，反映至迟东汉晚期“袁”已取代“棟”、“轔”等姓氏用字而成为该族姓氏的惟一用字<sup>③</sup>，这一认识与《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文献中仅见“袁”氏人名的统计结果也是一致的。天长纪庄汉墓17号木牍所载棟姓在东汉及其以后各代的消失，正与今之“袁”姓在秦汉历史上的这一姓流变过程有关，这也恰恰即是天长纪庄汉墓17号木牍在姓氏学上的独特价值所在。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任崇岳、袁立泽、袁延胜、陈刚及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整理小组诸位师友、同仁的热情帮助和悉心指教，特此致谢！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①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6年，第70-71页。

②范晔：《后汉书》卷八，第340、342页。

③这一认识也得到东汉晚期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有关袁姓记载的佐证。《潜夫论·志氏姓》：“帝舜姓虞，又为姚，居妫。武王克殷，而封妫满于陈，是为胡公。陈袁氏，咸氏、舀氏……司城氏，皆妫姓也。”（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97年，第427页）